



照见党性初心 折射公仆本色

■姚建龙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有什么样的党性,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它照见的是党性初心,折射的是公仆本色。

第一,党性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决定性因素,公与私是衡量党性强弱的尺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作为党的干部,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守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政治操守。只有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摒弃个人私欲的干扰,形成正确的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

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思想基础,是践行立党为民、执政为民的价值坐标。要常思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看淡个人得失,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

政绩观出现种种问题,本质上是党性不纯、立场不正的表现。部分党员干部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将个人升迁、私利得失置于党和人民事业之上,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其内在根源就在于党性弱化、私心杂念占据上风。

党性坚强,则政绩观端正,就能够形成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的思想自觉,干事创业也就能够立足于公、为大家大我,而非为私、为小家小我;党性不纯,则政绩观必然扭曲,就不能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就会在是非、义利、权力、事业的抉择中出现偏差。

第二,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是校准政绩观的根本途径。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着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的核心要求,是改造主观世

界、摒弃私心杂念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深刻把握关于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义,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

要在学思践悟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让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该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坚持真理、求真务实,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

对领导干部而言,尤其要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多做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让每一项政绩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第三,把政治修养摆在首位,确保政绩观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而是实在的。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政治修养是党性修养的核心内容与首位要求,是保证政绩观不偏离正确方向的关键。要始终同党中央同心同德,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作为根本政治担当,要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不断提高“政治三力”,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能力保障。政治判断力要求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精准辨别政绩观上的是非对错,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政治领悟力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避免政绩观出现偏差;政治执行力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完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服务人民群众的实际成效,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注入强大力量。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

以深入调查研究为抓手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逢淑玲

《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明确提出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强调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通过督促检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反映等途径,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

大兴调查研究,不仅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更是校准政绩立场、锚定政绩导向、完善政绩路径、检验政绩作风的重要抓手。调研越是走深,政绩越会向实。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一线,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为抓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确保每项政绩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坚持立党为公 校准政绩立场

立党为公是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场,解决的是“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人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决定了领导干部只有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调查研究的过程,正是深入基层、接触群众、接受党性锤炼和检验权力行使的过程。只有通过扎实调研,才能破除“唯上”“唯己”等私心杂念,校准权力行使的政治方向,不断强化立党为公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方面,要在调查研究中锤炼党性,把立党为公内化于心。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我们讲的调查研究是带着鲜明党性的政治实践,只有站在党和人民事业全局高度来谋划调研,才能摒弃功利化、个人化倾向,不断厚植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确保政绩观不偏向。

另一方面,要在调查研究中秉公用权,把立党为公外化于行。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要把秉公用权贯穿调研始终,把权力行使建立在坚定民意和客观实际基础上,避免因个人好恶、局部利益或政绩冲

动等随意用权,让立党为公真正成为行动自觉。

坚持为民造福 锚定政绩导向

为民造福是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解决的是“树什么样的政绩”的问题。“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是对群众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现实中,“形象工程”等之所以存在,往往在于对群众需求了解不深、对民生痛点掌握不准。大兴调查研究,正是通过倾听民声、检验政绩作风的重要抓手。调研越是走深,政绩越会向实。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一线,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为抓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确保每项政绩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一方面,要在调查研究中倾听民声,把人民需求作为政绩导向。领导干部要多通过“四不两直”方式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到群众中去,到条件艰苦、矛盾问题集中的地方去。通过调查研究,真正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摸准摸透,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精准对接,从根本上矫正只把领导注意力和个人私利作为出发点的政绩观偏差,确保政绩目标对准真问题、回应真需求。

另一方面,要在调查研究中检验成效,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政绩标尺。为民造福不能自说自话,政绩成色最终要由群众评判。要建立基于调研数据的政绩检验机制,把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核心指标,既看显绩,又看潜绩。要建立健全调研成果转化机制,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实事,对堵点痛点难点问题边查边改、立行立改,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确保每一项政绩都经得起群众口碑检验。

坚持科学决策 完善政绩路径

科学决策是正确政绩观的方法路径,解决的是“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政绩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深刻认识和把握基础上的产物,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决策,难免导致形式主义的政绩工程。调研的深度,决定决策的精度。调查研究是把握规律、汇聚民智的重要前提,是科学决策的源头活水。只有将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全过程,遵循“先调查、后研究、再决策”的逻辑链

条,才能防止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重程序轻实效等问题。

当前,少数领导干部之所以容易出现决策失误、工作失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调研不深入、研究不彻底。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前置程序和必经环节,由表及里把握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从源头上防止拍脑袋决策、凭经验办事。以调查研究汇聚智慧,增强科学决策的民意支撑。科学决策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想出来的,要综合运用实地调研、座谈访谈、蹲点调研等方式,广泛听取多方利益主体的意见、建议,把各方智慧转化为决策参考。建立“回头看”机制,通过持续调研掌握进展、识别偏差、调整策略,主动接受群众评判,确保决策在执行中不缩水、不变形、不跑偏。

坚持真抓实干 检验政绩作风

真抓实干是正确政绩观的作风保证,解决的是“如何实现政绩”的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是阻碍正确政绩观落地的重要挑战。深入调查研究是真抓实干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调研过程本身就是抓落实的过程,调研成效也直接反映领导干部作风是否扎实。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锤炼过硬作风的重要载体,引导领导干部在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中树牢正确政绩观。

要以调查研究推动闭环落实,在“钉钉子”中务求实效。要建立“问题发现—方案制定—执行跟踪—效果评估”的全链条闭环机制,对调研中发现的民生痛点、发展堵点等明确责任主体、整改时限,坚决杜绝“调而不研、研而不决、决而不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营造重实干、重实绩的良好政治生态。要以调查研究锤炼过硬作风,在从实从细中树立实干之风。真抓实干,既要祛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也要摒弃急功近利、贪大求快的短视思维。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抓手,引导领导干部真正沉下心来、扑下身,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功。以调研的严实作风倒逼工作落实,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让真抓实干成为领导干部的鲜明底色。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陈建华 刘松浩

“十五五”时期,要聚焦深耕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区、打造生态优势转化新标杆、打造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的“一田三新”总体定位,高水平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

第一,深耕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区,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集成。

一体化制度创新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区域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它通过打破行政壁垒、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构建统一高效的制度体系,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十五五”时期,可在“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的一体化探索中,加快推进区域政务服务一体化合作,加快区域市场体系建设。

比如,构建“改革授权—制度创新—推广发布”工作闭环,提升制度创新成果的示范效果;推进建立三地信息共享机制,开展公共数据资源应用,促进跨区域通办与一体化服务;推动三批国家层面改革授权事项和首批省级改革授权事项在示范区落地生根、形成更多案例。

其中,青吴嘉高新区将制定统一的发展战略规划,出台统一的支持政策、搭建统一的统计平台、建立统一的跨域管理机制、推进统一的制度系统集成,积极推进高新区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打造生态优势转化新标杆,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统筹各类生态要素,实施系统性保护是应对跨区域生态环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生态绿色”为立身之本、发展之基,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进一步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比如,通过跨区协同与共保联治,纵深推进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引导传统产业低碳转型,打造示范区绿色低碳产业集群;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重点行业碳排放预算管理,深化示范区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试点。

可在持续推进太浦河、淀山湖岸线贯通及水系生态治理的基础上,依托示范区的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探索全域古镇旅游,不断深化绿色田园、古朴乡村、现代城镇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

第三,打造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建设全域创新场和孵化器。

当前,经济博弈与竞争日益聚焦于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控权上。谁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世界科技革命前沿领域取得突破,谁就能掌握发展主动权。“十五五”时期,高水平推进示范区建设,要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互联网、绿色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发展新动能,吸引集聚初创企业和高水平研发人才,拓展科技创新策源和国际交流合作功能,建设全域创新场和孵化器。

自成立以来,示范区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于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在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绿色新材料、绿色能源等研发方面发展迅速。“十五五”时期,可共建一批高能级科创平台,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升创新孵化和产业转化效能;统一数据格式、接口规范和质量标准,形成动态化、可追溯的数据流通体系,为创新主体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

第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创造更高质量的生活环境。

更高品质的生活环境是吸引人才、资本和创新要素的重要因素。“十五五”时期,高水平推进示范区建设,一个重点任务就是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公共服务资源便利共享。

近年来,示范区在公共服务领域实现了“打通断点”到“深度融合”的跨越,共建共享机制不断深化。下一步,可通过机制创新与资源统筹,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构建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推动医疗资源联动与共享,推进深化医疗一体化服务,提升居民就医便捷性,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共浙江省嘉兴市委副书记、政策研究室主任)

高水平推进示范区建设

文化出海,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刘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尘封于博物馆的“静态遗产”,而是奔涌于时代脉搏中的“动态资源”。如何让这些深植于东方文明土壤的文化符号,在异质文化语境中被“看得见、读得懂、接得住”,已然超越技术层面的传播策略之争,升华为一场关乎文化主体性重塑与文明共生力建构的深层变革。

内容创新:从“厚重典籍”到“可感生活”,实现文化符号的当代转译——

跨文化传播的第一重困境,在于“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之间的符号壁垒。破解这一困局,需借“高语境与低语境”理论及“编码—解码”理论。它意味着,文化传播不应是符号的机械搬运,而是意义的再生产。为此,应倡导一种“文化转译”思维:在不损伤精神内核的前提下,将精英化、典籍化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当代生活美学。

近年来兴起的“新中式”美学风潮,是这一转译逻辑的典型实践。比如,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黄金饰品加入购物清单,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款式备受青睐。从龙凤呈祥的吉祥纹样,到花丝镶嵌的繁复工艺,再到篆刻点蓝的精湛技法——这些承载着东方美学的文化符号,经由匠人之手化为可佩戴、可触摸、可珍藏的黄金饰品,成为海外游客带回家的“中国故事”。这便是文化转译的生动实践:将厚重的传统工艺转化

为可感知的当代生活美学,让中国文化以温柔的方式走进异国他乡的生活日常。

形式创新:从“单向展示”到“沉浸体验”,削弱跨文化理解的“文化折扣”——

传统文化传播形态多以“展示—观摩”为主。然而,在数字媒介塑造的“游戏化”代际心理结构中,Z世代更倾向于通过“参与”实现“认同”。元宇宙、数字孪生与空间计算等技术的引入,可实现沉浸式体验弥补数字传输的不足。这正是破解“文化折扣”的密钥——通过构建高交互的沉浸式场景,降低跨文化理解的心理阻力。

在数字科技赋能下,这一理念正成为现实。湖南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成全国首个规模化微短剧智能译制中心,整合大语言模型、语音识别、语音克隆与合成技术,可实现多语种自动翻译、配音及字幕生成。过去人工翻译一部微短剧需要一到两周,现在仅需数小时就能完成,已推出3000多部作品,吸引数千万海外观众。这种技术赋能的文化传播,让中国故事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走向世界。

短视频时代的跨文化传播,遵循“情绪优先于叙事,峰值优先于整体”的法则。前段时间很火的“戏曲变装”,将博大精深的戏曲艺术,提炼为一个高浓度的“审美爆点”,以更符合现代媒介特质的方式,完成对全球用户的一次触达。这种游戏化的处理,让戏曲动作脱离舞台的物理限制,成为一种可以在全球数字空间流动的视觉资产。短视频平台的创新之

处在于,它不再要求受众“走进来”,而是让文化“流出去”。一个美国用户可能完全不懂中国戏曲,但当他在镜头前卡点完成从卫衣到戏服的转变时,就“体验”了一次戏曲的亮相。这种通过“做”而获得的体验,有时比通过“看”获得的印象更为深刻。短视频推动的跨文化传播形式创新,本质上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从一种“被阐释的对象”转化为一种“可体验的环境”。

途径创新:从“官方渠道”到“多元节点网络”,激发文化传播的“蒲公英效应”——

传统对外文化传播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大外交”模式,具有渠道集中、信息同质、层级分明的特征。这一模式在塑造国家品牌形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实现分众化传播、社群化传播方面往往面临“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瓶颈。

传播理论揭示,文化信息的传播效能,取决于中介节点的社会资本与信任黏性。在算法分发的媒介生态中,无数个“微节点”构成文化流通的真实毛细血管。跨文化传播亟待从“单一中心、树状分发”转向“多中心、网状扩散”,一批活跃于B站、小红书、YouTube等平台的文化类创作者正扮演这种“文化中介者”的角色。他们用专业内容将分散在全球的、对中国文化有潜在兴趣的个体“圈层化”地聚合起来。

比如,一个手工达人讲解用榫卯结构制作机器人玩具的视频,吸引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手工爱好者;模型发烧友和建筑系学生。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社群,其黏性和活跃度

远高于被动接收信息的受众群体。算法精准地将“可能对榫卯感兴趣的中国人”与“硬核手工达人的视频”连接起来。这种“人—内容—算法”的三角循环,实现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的精准跃迁,传播路径从“中央—地方—个人”的垂直灌输转变为“节点—社群—网络”的水平渗透。

“多元节点网络”带来的最大效能,是实现文化传播的“蒲公英效应”——种子源自大地,随风而起,散落千山,落地生根。当中国文化通过值得信赖的“中介者”,以“去陌生化”的方式嵌入全球青年的知识结构与审美趣味时,文化传播才真正实现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质变。

方法创新:从“宣传说教”到“共情叙事”,构建跨文化理解的“第三空间”——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是将“传播”等同于“宣传”,将“讲好中国故事”窄化为“讲中国的辉煌成就”。这种宏大叙事视角,往往忽略了个体作为文化载体的温度与复杂面向,也较难激发异质文化群体的深层共情。

在文明异质性条件下,国际传播应构建一种兼顾包容性与主体性的传播形态。面对文明范式的深层差异,传播的有效性不再仅仅取决于信息输出的数量,而更取决于能否实现深层文明范式之间的对话与转译。从共情叙事视角出发,把共情与叙事结合,能够达成情感与认知的协同发展,有效引发情感共鸣,认知共情与行为支持。

聚焦个体“守护者”叙事,是一种有效的微策略。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之所以引发海内外观众共鸣,很重

要的就是它呈现了修复师们日复一日的静默,与千年文物对视时的小心翼翼以及修旧如旧的质朴欣喜。文化是生命力,在这种具身的、非表演性的日常中得以彰显。

更具张力的是中外文化对话的“他者叙事”。美国网红“甲元哥”在中国拍摄的vlog,以夸张的表情、未经修饰的“震惊”反应,意外成为外网了解中国社会的流量窗口。他以“外来者”的陌生化视角,发现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生活细节:高铁上的安静、深夜街头的小吃摊、公园里写毛笔字的老人。这种“他者”的惊奇与领悟,构建了一种“第三空间”,完成了文化意义的再协商。这启示我们:跨文化传播不是以“同化”为目的的单向驯化,而是以“对话”为方法的双向奔赴。允许被传播者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视角去理解并重构中华文化,这种“被理解的开放性”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深层表达。

通过内容的本土化转译、形式的场景化融合、途径的数字化连通、方法的共情化叙事,传统文化正在完成一场深刻的“主体性重塑”——它依然是中国的、悠久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年轻的。面向未来,跨文化传播的本质,是一场始于语言、抵达价值的文明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既要以“守正”的定力守护民族文化的根脉,也要以“创新”的勇气探索跨文化表达的新语法。唯有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在与世界文明的深度融合中,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内涵,并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现代性困境贡献东方智慧与方案。

(作者为上海电机学院外国语学院)


 扫二维码
看解放日报理论
版“解放”思想”
更多文章